

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

——吕向、尹愔传论

傅璇琮

中国古代翰林学士，开始设置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当盛唐之世。自此之后，历宋、元、明、清，翰林学士一直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直至1901年，正当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之后，清朝廷还于6月5日下诏令，称翰林院为“储才重地”（《光绪朝东华录》）。在唐代，翰林学士为文士参预政事的最高层次，很值得研究。据现有史料，唐代翰林学士可考知者约二百余人，其中有不少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本文为最早的两位翰林学士立传，既拟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想从这两位学士经历的考述中提供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

吕向传

吕向，《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中有传，云：“吕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涇州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涇州属当时关内道，治所保定县在今甘肃东部涇川县。传又云：“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此又见《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谓琯少好学，“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按房琯为河南（治洛阳）人，陆浑伊阳山即在河南府内。《旧·房琯传》又云：“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

书》一篇及牋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这就是说，开元十二年（724），房琯始出仕，而吕向于开元十年（722）被召为翰林供奉（详后），则房、吕二人在陆浑伊阳山共居读书，当在玄宗开元初十年间。又按，《旧·房琯传》此处称“东平吕向”，而泾州所属无东平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东平为郛州州治所在县，在今山东省西南。《旧·吕向传》仅谓“或曰泾州人”，而《旧·房琯传》则明确称“东平吕向”。又中唐德宗时窦蒙所作《述书赋》也提及吕向，称为东平人（《全唐文》卷四四七）。则吕向当为东平人，世系不明，当出身于一般平民。

按房琯后于安史之乱初期，曾从肃宗于灵武，“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曾率兵与安史乱军战于咸阳陈涛斜，败绩。《旧传》载其于广德元年（763）卒，年六十七。据此，则房琯当生于武周神功元年（697），开元元年（713）为十七岁，开元十年（722）为二十六岁。吕向既与他同在陆浑读书，当年岁相近，其生年或为697年左右。

又《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载《五臣注文选》三十卷，云：“衢州常山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良、处士张铤、吕向、李周翰注，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之。”《全唐文》卷三〇〇有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云：“乃求得衢州常山县尉臣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臣良、处士臣张铤、臣吕向、臣吕周翰等，或艺术精远，尘游不杂，或词论颖曜，岩居自修，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记其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复三十卷。”这里“词论颖曜，岩居自修”，当指吕向。可惜这里提到的几个人，除吕向外，两《唐书》皆无传。吕延祚则于开元初曾为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与卢怀慎等合撰法令格式《开元格》，于开元三年三月上奏（见《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如此，则他于开元六年在朝为工部侍郎，当可信。这里可以注意的是，《文选》五臣注于开元六年上，成书当在此前数年间，

这时吕向为“处士”，与前所述吕向与房琯隐于陆浑山合。由此亦可知吕向于二十岁左右即参与《文选》注，尚未出仕。这与《新传》所云“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也相合。可见吕向早年即有文名，且善于书法：“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紫发然，世号‘连锦书’。”（《新书》本传）大约因此，遂于开元十年被召入翰林院，为翰林供奉。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时为翰林学士的韦执谊撰《翰林院故事》，记述翰林院之缘起及自玄宗以后入院学士之名次，这是唐代第一部有关翰林院学士记载的著作。《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关于翰林学士的记叙，也大多本此。韦执谊把开元时翰林学士院的建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翰林院，设翰林供奉；第二阶段建立学士院，从翰林供奉中选拔一部分进入，即新设翰林学士，而另一部分依旧为翰林供奉，仍在翰林院。这是符合实际的。其具体叙述为：“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告，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偏掌，列于宫中，承导迹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后又云：“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垪、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这里把吕向、尹愔作为首批翰林供奉，当符合实际，但吕向之以中书舍人，尹愔以谏议大夫，乃入为学士，他们二人在任翰林供奉时还未有此官阶，这是一；张垪、刘光谦并不是开元二十六年首列为翰林学士，首列为翰林学士的仍为吕向、尹愔。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因成书较早，影响较大，多为后人作为依据，因此应加辨析。^①

《新唐书》吕向本传明确记载：“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又《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贺知章传》：“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史，

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下·赵冬曦传》：“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真入集贤院修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由此可见，开元十年，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推荐贺知章等入丽正殿修书，其中有吕向，而吕向此时为翰林供奉。这都可证实，吕向确于开元十年入为翰林供奉，而《翰林院故事》认为是“首充”，则很可能翰林供奉是开元十年正式建置的，在这之前曾有所谓翰林待诏，实未正式定名。

又，这里稍加订正的是，上面引述的《新唐书》吕向与赵冬曦传，都将丽正殿称为集贤院，而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谓：“（开元）七年，驾在东都，于丽正殿置修书史。十三年……因改名集贤，改修书史为集贤书院学士。”这就是说，开元十年，尚不应称集贤院。由此可知，《新书·吕向传》称吕向召入为翰林供奉，又兼集贤院校理，应是丽正殿校理。^②

对此，还可举一佐证。宋人所编的两部类书，即《职官分记》（卷十五）、《玉海》（卷三一、卷一六七）所引唐韦述《集贤注记》，有云：开元十一年，丽正学士张说（时为宰相）率丽正殿文士向皇上进献所赋诗，“上各赐赞以褒美之，敕曰：‘得所进诗，甚有佳妙。风雅之道，斯为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上自以五色笺八分书之。”就是说，玄宗读到各文士的诗作，甚为欣赏，就按各人的“才能”分别赐以赞词，如张说为：“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逸，翰苑光鲜。”贺知章为：“礼乐之司，文章之苑。学优艺博，才高思远。”其中也有吕向，注为“校理”。其赞词为：“族茂飞熊，才方班马。考理篇籍，抑扬风雅。”应当说，校理的品阶并不高，在学士之下，但这四句的评语却是不低的。在赐赞词后，玄宗又令画像，藏于书院，有张说、

徐坚、贺知章等十八人，其中也有吕向。见《历代名画记》卷九。这真有如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令阎立本画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像，立于宫中，因此当时称能入文学馆者，谓之“登瀛州”（见《唐会要》卷六四，《历代名画记》卷九）。由此可见，吕向当时的翰林供奉之地位与境遇，是大大优于天宝初同为翰林供奉的李白^③。

《新唐书·吕向传》在记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后，接云：“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吕）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此《美人赋》见《全唐文》卷三〇一，从文中看不出写作时间^④。按吕向于开元十三年春已为左补阙（见后）。左右拾遗为从八品上，左右补阙为从七品上。吕向当由左拾遗迁为左补阙，则其因进《美人赋》而擢为左拾遗，当在开元十一、二年间。由此可见，翰林供奉，其本身就须带有一定官衔，以后设置翰林学士时也是如此。这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说：“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廿二史考异》卷五）；“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同上，卷五八）。这就是说，吕向于开元十年召入为翰林供奉，当带有官衔，不久迁为左拾遗，后又升为左补阙，而其职事则仍为翰林供奉。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七五著录有《述圣颂并序》，题下署为“京兆府富平县尉达奚珣撰序，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吕向撰序并书”。又引《石墨镌华》，云：“碑在华阴县岳庙中，达奚珣撰序，吕向撰颂并书，不著年月。”此云“不著年月”，实则可以考知。宋王应麟《玉海》卷三一《圣文·唐华阴祠碑阴》亦记此事，并引《会要》：“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庚午，上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祗勒石华岳祠南道，上御制碑文，仍书之”。此事亦见《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

之道周。”《新唐书·吕向传》：“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

唐玄宗的《西岳太华山碑序》载于《全唐文》卷四一，中云：“十有一载，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师，停銮庙下。……迟回刻石，梗概铭山。”此“十有一载”之“一”，据上引《旧纪》，当作“二”。

从上述材料，可以确定，玄宗于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自长安赴洛阳，途中经华阴，为作华岳祠庙文。第二年，乃于祠庙南立碑（《玉海》卷三一引《通典》“十三年于华州岳祠南立碑”），即命吕向赴华阴刻石，吕向则因此与时任京兆府富平县尉达奚珣为玄宗立碑而撰《述圣颂并序》，颂为吕向作，序为达奚珣作。达奚珣《华山述颂序》（《全唐文》卷三四五）即记皇上撰文，“藻翰自天，发挥神化，建碑于庙，以光宠焉”，于是“乃命朝英，实司其事”；文末谓：“敢托吕补阙向为之颂云。”则吕向此时确带左补阙的官衔。

吕向此行的官衔与时间，还可有两个佐证。一为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全唐诗》卷一一八），中有“语别梅初艳”、“往来春不尽”句，与诗题之“春初”合。二为徐安贞（开元中任中书舍人）诗《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全唐诗》卷一二四），有云：“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开元十三年春，玄宗仍在洛阳，吕向当奉命自洛阳赴华阴勒碑刻石，故徐安贞诗谓“春归洛水边”。大约吕向离洛阳时，朝中有好几位文士为之赠诗饯行的。时孙逖也任为左补阙（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

这里要说明的是，前引《金石萃编》著录《述圣颂并序》，所署吕向官衔为“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此处的“集贤殿”有误。因吕向此行为开元十三年春，而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在同年四月，此当为四月后补加。按规定，五

品以上官可为集贤殿学士，五品以下为直学士。这当是吕向在翰林供奉任职期间因带有从七品上的左补阙，因此又兼集贤殿直学士。

《新书》本传接云：“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弓矢射禽。向上言……帝顺纳，诏蕃夷出仗。”吕向所议，《全唐文》卷三〇一题为《谏令突厥入仗驰射疏》，其文意较《新唐书》所载为畅晰（宋祁往往将原作改得艰涩）。不过吕向这里还是出于民族偏见，以为突厥等首领“丑性毒行，久务常积”，不可信，因此不能使之在封禅行列中与皇上接近。玄宗封禅泰山在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十一月间，则吕向于此时已由从七品上的左补阙迁为从六品上的起居舍人。

《新书》本传又接云：“久之，迁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眷赉良异。”未载升迁时间。今查宋赵明诚《金石录》目录第一千三十一有《唐龙角山纪圣铭》，谓：“明皇撰，并八分书，开元十七年九月。”清人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所记则较详，其书卷六著录有《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谓在浮山（今山西东部）。末署“开元十七年太岁己巳九月乙丑朔三日辛卯建”。《山右石刻丛编》录有全文（《全唐文》卷四一唐玄宗名下亦有《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文后有《庆唐观纪圣铭碑阴》，首列诸皇子及朝中大臣姓名、官衔，后有吕向，署为：“敕建造模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颖王永王文章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可见这次也如前开元十三年奉命赴华阴勒碑同样，吕向为建造模勒专使前往龙角山并题碑阴，此时他已为主客郎中。主客郎中为从五品上，因此可正式充任集贤院学士，但仍为翰林供奉，并兼皇太子及玄宗诸子侍读（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十三年三月甲午，诸皇子改名并改封王名，如郾王嗣直改名潭，徙封庆王，陕王嗣昇改名浚，徙封忠王，等，此碑

阴所署诸王王名均为改称以后者，可见《山右石刻丛编》所记确为可信）。

吕向在带主客郎中期间，诗人储光羲曾有诗献之。储光羲《贻主客吕郎中》（《全唐诗》卷一三九），题下自注：“即皇太子赞谕”。此称主客郎中，又谓太子赞谕，皆与前所引庆唐观碑阴题名相符，当即为吕向^⑤。诗云：“上士既开天，中朝得为贤。青云方羽翼，画省比神仙。委佩云霄里，含香日月前。君王悦借问，客有《上林》篇。”按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进士登第，登第后尚有几年未释褐入仕，现可知者约开元十八年官安宜县尉。开元十九年迁下邳县尉^⑥。而吕向于开元十九、二十年已改为都官郎中（详后）。储光羲另有《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全唐诗》卷一三九），有云：“少年不得志，走马游新市”。孟浩然有和作《同储十二洛阳道》，据佟培基《孟浩然诗集注》卷中^⑦，谓储、孟二诗均作于开元十五年春，时二人均在洛阳。此说可信。储光羲此前虽已登进士第，但未得入仕，故有求于吕向，希望他向上推荐（“君王悦借问，客有《上林》篇”），并将吕向赞誉为“开天”之“上士”，“画省”之“神仙”，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士人对翰林供奉能亲近君主的地位已相当看重。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云：“（开元）二十年，阙特勒死，诏金吾将军张吉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亦记此事，谓：“使金吾将军张吉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但《新唐书》记为开元十九年，与《通鉴》卷二一三所记同，《通鉴》记开元十九年“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当时唐朝为与突厥修好关系，故其左贤王阙特勒卒，特遣朝臣吊丧，并为刻石立碑。此时吕向已改为都官郎中。

《新唐书》吕向本传接着记其父卒，“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据前所述，吕向于开元十九年三月已为都官郎中，开元二十

六年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详后），则其守丧及免丧后迁为中书舍人，当在此数年间。《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有记云：“故金刚智三藏行记一卷，右灌顶弟子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吕向敬师三藏，因而纪之。”吕向为金刚智法师作传记，又见于中唐时权德舆《唐大兴善寺故大宏教大辩正三藏和尚影堂碣铭并序》（《全唐文》卷五〇六），中云：“初先大师之灭也，吕工部向、杜卫公鸿渐为之记。”按吕向、杜鸿渐所作记文，今皆不传。《宋高僧传》则有传，其书卷一《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记金刚智于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既望”卒，“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⑧据此，则吕向任中书舍人约在开元二十二、三年间。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建翰林学士院，以“太常少卿张垚、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此不确^⑨。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开元后八人”，首二人即为吕向、尹愔，记吕向为：“中书舍人充供奉，出院拜工部侍郎。”此处“供奉”二字衍，因吕向此前早已是供奉，开元二十六年是人为学士。吕向在这之前已有文名，此时已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本来就是为皇帝起草诏诰文书的，在建立翰林学士时，吕向以中书舍人入充，理所当然。在以后中晚唐时，翰林学士于任期内往往是以升迁中书舍人为荣的。

《新唐书》本传云：“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赠华阴太守。”丁居晦所记，则以吕向后出院，任工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下，高于中书舍人）。但何时出院，何年卒，未有确记。宋佚名《宝刻类编》卷三，录有吕向所作碑目五件，其中《龙兴寺法现禅师碑》，天宝元年九月立；《长安令韦坚德政颂》，天宝元年；《寿春太守卢公德政碑》，天宝二年建。又《唐代墓志汇编》收有《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驸马都尉中山郡开国公豆卢公（建）墓志铭并序》^⑩，署为“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

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吕向撰”。据文中所记，豆卢建卒于天宝三载三月廿四日，同年八月葬，则此时吕向尚为中书舍人，未出院。其出为工部侍郎，及卒，则当在天宝三、四年间。

吕向自开元十年为翰林供奉，至二十六年正式为翰林学士，其间虽有居丧，但其在翰林供奉任职，总有十余年，可以说是唐代建立翰林院后供职最早、任期最长的一位。就他在这期间的作为来看，当时的翰林供奉，并不是如后世所记仅系工艺书画之徒，及僧道、医官、占星等（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翰林》条）。据《新唐书·百官志》所记，翰林供奉在开元二十六年，“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即行使中书舍人的部分职能。此外，就吕向的有关材料，翰林供奉还有以下一些情况：一、为皇帝勒碑刻石，做文字方面的服务工作。如吕向开元十三年至华阴，开元十七年至浮山，均为玄宗所作碑文书写刻石，发挥其书法才艺。杜甫于天宝时作有《送翰林张学士南海勒碑》（《钱注杜诗》卷十）。可见这是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作为文士所行使的职务。至于开元十九年奉命出使突厥，虽是专使之命，但也是奉皇帝之命去刻辞立碑的。二、翰林供奉处于宫中，接近皇上，也就因此而能参预政事，进行规谏。如吕向于开元十年刚召入为翰林供奉，就因玄宗常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就特地写上《美人赋》加以劝谏。《新唐书》本传说是“帝善之，擢左拾遗”，但据德宗时窦蒙《述书赋》所记，吕向这一举动当时是有风险的，说他奉上此赋，“忤上”，就是触怒了皇帝。据《述书赋》自注所引张说谏文，玄宗甚至因此而想将吕向杀死的。张说所作的谏文中说：“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乎？使陛下后代有愆谏之名，而（吕）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①玄宗因张说进言，才改变态度，对吕向给予赏赐。这使吕向如《述书赋》注中所说，“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主讽谏”。这也是以后翰林学士参政议事的先兆。三、作翰林供奉者一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吕向，年轻时

就参与《昭明文选》的注释，成为后世有影响的《五臣注文选》作者之一。他尤善于书法。《述书赋》称为：“吕公欧钟相杂，自是一调。虽则筋骨干枯，终是精神嶮峭。其于小楷，尤更巧妙。”其注文更赞其“文词学业，当代莫比”。正因此，开元时以诗文著称的徐安贞、王翰及储光羲等，都与之有诗文交往。中晚唐时，有些翰林学士本身即为诗文名家，有些则与其他文士素有交往，这在开元时即有开端。四、《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记有《严从集》三卷，云：“（严）从卒，诏求其藁，吕向集而进焉。”严从，两《唐书》无传，生平不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录有严从《中黄志》三卷，云“右唐严从，开元中为著作郎，春官侍读，集贤院学士卒。自号中黄子。当时命太子侍文吕向访遗文于家，得《训考》、《经颂》等八篇，序为三卷。”严从于开元中为太子侍读，又为集贤院学士，与吕向同职，当为同时友人，故吕向奉命为其編集。从中唐开始，翰林学士奉皇帝之命编前世或当世诗文集者，其例甚多，著名者如令狐楚奉宪宗之命编大历前后诗作《御览集》，今传世^⑫。

尹愔传

尹愔，附见于《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下《赵冬曦传》后，因赵冬曦于开元中曾为集贤院直学士，故于传末云：“开元集贤学士，又有尹愔、陆坚、郑钦悦、卢僎，名稍著。”其后即附尹愔等四人简传。

据传，尹愔为秦州天水（今属甘肃）人。其父名思贞，“明《春秋》，擢高第”，曾因张说之荐，为四门助教。尹愔之父治儒学，而尹愔本人则专攻道家玄学，传称其“博学，尤通老子书”，后遂为道士。《太平广记》卷二六《叶法善》条，记叶于庚申六月三日卒于长安景龙观，时“弟子既齐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按叶法善自曾祖起，三代均为道士，唐高宗时即有声名。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有专传，谓“自高宗、则天、中宗历十五年，常往来名山，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玄宗初，“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当时尊宠，莫与为比”。卒于开元八年。开元八年即庚申（720），与《太平广记》所载卒年合。由此可见尹愔于此时也已为道士，为名家叶法善弟子。

又《全唐文》卷九二七载尹愔所撰《五厨经气法序》一文，文末署：“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京肃明观道士臣尹愔上。”文中有云：“伏读此经五章，尽修身卫生之要。全和含一，精义可以入神；坐忘遗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辄为训注。臣草莽微贱，恩霈特深，天光不违，自忘鄙陋。俯伏惭惧，彷徨如失。臣愔顿首顿首。”此段文字甚可注意：一、自称为道士，时间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十一日。二、这不是一般性的序文，文末所署，于姓名后特标为“上”，文中好几处都自称为“臣”，且云“恩霈特深，天光不违”，显然是因受皇上恩眷，特以所注之书进献。这就与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所载开元中设置翰林供奉，吕向与尹愔“首充”相合。不过韦执谊所记，二人为翰林供奉时，吕向为中书舍人，尹愔为谏议大夫，有误，吕向事，前已辨析，尹愔事详后。

吕向于开元十年人为翰林供奉，尹愔何时为翰林供奉，限于史料，未可确知，但从上引《五厨经气法序》，则开元二十三年以前当已任翰林供奉。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道士是否能充翰林供奉？《新唐书·百官志》一，只说“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实际上唐代的翰林供奉，范围是相当广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有记，谓：“上（指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翰林》条，据两《唐书》，记唐列朝工艺书画之徒，及僧人、道士、医官、占星等，均入

“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顾炎武并举有具体例子：“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烜，贞元末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奕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此处所列，都是有史料依据的。又如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五著录《简寂先生陆君碑》，署为“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文并书”。吴筠也是唐玄宗时人，不过比尹愔稍后，主要活动在玄宗天宝及肃宗上元时。又如《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敬宗宝历）二年三月戊辰，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以上事例皆可佐证，尹愔于开元中后期虽为道士，但也入翰林院为供奉，他之编注《五厨经气法》，可能也是受命而作的。《全唐文》卷九二七载丁政观《谢赐天师碑铭状》，中云：“敕内肃明观道士尹愔宣敕，内出御文，赐臣师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此也正可证实尹愔虽为道士，实在宫中任职，即翰林供奉。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开元二十五年正月，“癸卯，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关于此事，《新唐书》尹愔本传有具体的记述：“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专领集贤、史馆图书。”从上引《五厨经气法序》，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尹愔已为京肃明观道士，并为翰林供奉，但未署有官衔，这次明确给予正五品上的谏议大夫，他以为要自道士退出，因此固辞，但玄宗仍允许其以道士身份从职，并可穿道服，他就服从。这时孙逖为中书舍人（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有他起草的《授尹愔谏议大夫制》（《全唐文》卷三〇八），有云：“道士尹愔，识洞微妙，心游淡泊，祇服玄言，宏敷圣教。虽浑齐万物，独谙于清真；而博通九流，兼达于儒墨。……可朝请大夫、守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事。”对其治学之精与博是极赞扬的。不过当时人

对他也有一定的看法，如《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记云：“开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衣道士服视事，亦服妖也。”

尹愔自以翰林供奉为谏议大夫并兼修国史，颇积极从事。如《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史馆》下，有记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按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罢相，李林甫兼中书令，遂集大权于一身，为控制史官记事权，就建议将史馆移近于中书省，尹愔则亦附和其议，就进言“移史馆于中书省北”，而当时中书省即在宫内^⑬。因此王维《和尹谏议史馆山池》诗（《全唐诗》卷一二六），首云：“云馆接天居，霓裳侍玉除。”云馆指史馆，谓此时史馆靠近皇帝居住之地，即在宫中。王维诗又表示对尹愔能以“霓裳”（即道服）而侍奉君王的羡慕之情。

按王维此诗，已称尹愔为谏议，且称其从职之地“史馆山池”，则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以后。诗中又有“春池百子外”，即在春日。王维约于开元二十三年三月前后在朝中任右拾遗，二十五年秋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二十八年冬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出使岭南^⑭。据此，则王维此诗很可能即作于开元二十五年春（开元二十八年尹愔已卒，见后）。王维此诗末云：“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意谓皇上恩眷既如此之深，则不应再弃官从仙。由此可见王维对尹愔的境遇也是很看重的。

于是，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创建翰林学士，就将吕向与尹愔作为首批引入。值得注意的是，尹愔当时是道士，而吕向又服膺于佛学，其于开元二十一、二年为高僧金刚智所作行记，自称“灌顶弟子”。玄宗作为一国之君，把这两位释、道之士召为翰林学士，可见开元盛世确有开放之气度，这对于研究唐代翰林学士的初创阶段，也颇值得思考。

不过尹愔在入翰林学士院后，未有事迹记述，可能因其不久即卒。《新唐书》本传记云：“开元末卒，赠散骑常侍。”未有确切年月。今查宋佚名《宝刻类编》卷三“名臣·唐”，于韩择木所书诸项，有《左散骑常侍尹愔碑》，下云：“吴巩撰，八分书，开元二十八年，京兆”。这是意外的发现。岑仲勉先生为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作补注，在考证有关学士事迹时也曾引及《宝刻类编》，但可惜于此处却失之交臂，未考及尹愔的卒年。今从《宝刻类编》著录的碑目，可知尹愔卒于开元二十八年或稍前，他任翰林学士大约只二年。吴巩为吴少微子。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吴少微于武周长安时（702—704），与富嘉謨以文齐名，当时称“富吴体”。吴巩事不详，《旧唐书·吴少微传》未称其“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尹愔卒后，由中书舍人为之撰碑，亦洵属不易。

尹愔著述，除《全唐文》所载《五厨经气法序》外，其他未见。上引王维《和尹谏议史馆山池》，是为和作，则尹愔亦曾有诗，且能为当时已有诗名的王维所和，可见尹愔在当时文士中亦颇有声誉。

注：

①尹愔、张垪、刘光谦事，将分别在各自的传记中加以辨析。

②岑仲勉《金石证史》中“丽正殿与集贤殿官制”条对此亦有论及，并解析谓：“不书丽正者，用其改定之名也。”（《金石论丛》页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③李白于天宝元年至三载为翰林供奉的情况，请参阅我另一篇论文：《李白任翰林学士辩》（《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④《南部新书》庚卷，记吕向此赋作于天宝末，误。吕向于天宝前期即已去世，见文中所考。

⑤此并可参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页125，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⑥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储光羲传》陈铁民笺。《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

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⑧《宋高僧传》，范祥雍校点，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

⑨详见另文有关刘光谦、张洎传辨析。

⑩《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⑪按张说此文，今不存。

⑫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⑬关于此事，《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史馆移置》系于开元十五年，《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史馆”条系于开元二十年，皆误。

⑭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王维传》陈铁民笺。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书局